前　言

本书的源起

这本书以我的视角，阐述中国是如何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的！

我不是经济学家，亦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政治学家，我只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和高校管理者，我有太多理由不写或者说写不了这本书。然而，我写这本书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是我的文化之根，华夏文化在我的血脉中流淌，“一带一路”倡议注定与我有缘。

我在新加坡长大，小学和初中都就读于华文学校，当时我就知道中国汉朝有一位名叫张骞的外交家、探险家。但直到 2013 年我关注“一带一路”倡议时，才开始对张骞有更多的了解。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对张骞（约公元前 164 年—公元前 114 年）有大段的介绍，其中的几句话让我很是惊讶：

> 张骞是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1]

我第一次读到这几句话是在 2016 年的春天，当时我在新加坡。我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外交家和探险家，也不是因为他是古丝绸之路的开拓者，而是因为百度将他定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1 张骞（约公元前 164 年—公元前 114 年），2019 年 9 月 1 日，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9%AA%9E/660225?fr=aladdin。

这样的评价给我很大的触动，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了情感上和思想上的共鸣，也让我意识到，与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第一个深入且广泛的全球倡议，可以且应该让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并代表东方文明的国家，引领 14 亿中国人在 21 世纪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

张骞雕像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pic/%E5%BC%A0%E9%AA%9E/660225/0/359b033b5bb5c9ea613ceb91d339b6003bf3b3f1?fr=lemma&ct=single#aid=0&pic=359b033b5bb5c9ea613ceb91d339b6003bf3b3f1。

中国拥有世界约 17%的人口，有着 5000 年的悠久历史，过去一直在努力，某种程度上现在仍然在努力“睁开眼睛看世界”。汉朝之前，中国早已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但张骞仍被视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根据百度的说法）。

当然，在张骞之后，中国又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发展，我不禁问自己，

中国现在真正做到“睁开眼睛看世界”了吗？如果“一带一路”倡议真的可以使中国“睁开眼睛看世界”，那么它不仅会给中国带来变革，也会给全人类带来变革。

这本书以我的视角，阐述中国是如何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力量的！

如前所讲，2016 年之前我未曾想过我会写这本书，也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写这么一本书。2016 年左右，我的工作发生变动，我由此了解到“一带一路”倡议如何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转型。“一带一路”倡议深深吸引了我，因为它体现了我所传承的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的中华文化。

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3 年的秋天发表了两次著名的演讲。一次是 9 月份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1]，另一次是 10 月份在印度尼西亚国会[2]。习近平主席在这两次演讲中首次擘画出一项意义非凡的变革性倡议的蓝图，也就是后来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出复兴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以谋求全人类共同发展。

关于习主席 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的演讲，中国外交部官网这样写道：[3]

> 习近平表示，2100 多年前，中国汉代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使命，两次出使中亚，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交往的大门，

1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2013 年 9 月 8 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zyjh_665391/t1078088.shtml。

2 吴姣，2013 年 10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讲话，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xiapec/201310/02/content_17007915_2.htm。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倡议中亚各国共建“一带一路”，2019 年 9 月 1 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xjpfwzysiesgjtfhshzzfh_665686/t1076334.shtml。

开辟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这片土地，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地方，曾经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过重要贡献。

千百年来，在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

习主席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

2013 年 10 月，《中国日报》英文版报道了习主席在印度尼西亚的演讲[1]：

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无，传递情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来自爪哇的奇珍异宝有着形象描述，而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则陈列了大量中国古代瓷器，这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是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实诠释。

通过这两次演讲，习主席向中国、向世界描绘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美好画卷！

时隔近 4 年，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在习主席的提议和支持下，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吸引了 29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内的 140 多个国家和 80 多个国际组织的 1600 余名

1 吴姣，2013 年 10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讲话，来源：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3xiapec/201310/02/content_17007915_3.htm。

外宾与会，但没有一位西方国家领导人出席。

2019 年 4 月 25 日至 27 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同样在北京举办，包括 38 位外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在内的 150 个国家、92 个国际组织的 6000 余名外宾与会。更为重要的是，东盟 10 国的国家领导及代表悉数到场，包括未出席第一届论坛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代表印度尼西亚出席论坛的是时任副总统优素福·卡拉（Jusuf Kalla）。意大利、瑞士、奥地利等国的国家领导亦到场参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论坛，并发表了演讲（见附录一）。

我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千年思维的转变》

坦白地讲，我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复杂，我是长大后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与中国建立联系的。与我在世界各地的众多中国朋友不同的是，我从未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接受过一天教育。虽然我在新加坡上的小学采用中文授课，中学也有中文课程，但我在中文、中国历史和文学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回想过去的学习，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大

多来自碎片化阅读，而非系统的学校教育。我在美国待了几十年，本科4年在美国东北部的新泽西州度过，我一位生活在美国南部的好朋友调侃我说“你比美国佬更美国佬”！

还有一点说起来也十分有趣。我有过好几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也许可以成为拥有国籍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力竞争者之一。我出生在英国殖民统治的印度，是英国子民，但我的第一份所谓护照的封面写着一句“Bearer has no right to abode in the British Isles”（持有者无权在不列颠群岛居住），这令我甚是难忘。这句话也是1972年生活在乌干达的印度人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一事实，在当年引发了乌干达大规模驱逐印度人的事件！

1964年，我离开新加坡前往美国。同年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我的护照也随之变成马来西亚护照。在美国待了1年后，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我也就失去了马来西亚公民身份。

1983年，在美国工作生活19年之后，我成了美国公民。由于新加坡不允许保留双重国籍，我虽然不情愿，甚至还有些伤感，但还是放弃了新加坡国籍。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告诉我以色列允许拥有双重国籍，所以他同时拥有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国籍。我得说，当我得知他拥有两国国籍的时候，我心里是有点嫉妒的。如果新加坡能够大度一点，我就可以保留“故乡”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了！ 1983年，我正式告别新加坡公民身份，也第一次理解了“地缘政治”的含义！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对我的学术以及职业生涯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1981年4月，受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邀请，我前往中国访问。这是我随父母1950年左右离开中国后第一次访问中国。在中国的3周时间里，我访问了北京、长春、武汉和上海，亲眼看到了中

国的发展状况，心里既兴奋又沮丧。在上海时，我尤其兴奋，因为处处都可以听到乡音——上海话！过去我只能与我的母亲、妻子、女儿讲上海话，但身处上海，我可以畅快淋漓地享受乡音。沮丧是因为我的亲友们还住在破旧的“筒子楼”里，生活贫苦拮据。那 3 周时间让我看到了一个经历闭关锁国后一贫如洗的中国。

40 年来，我曾无数次访问东亚，特别是中国大陆，但我从未真正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直到 2019 年 4 月，我受聘担任海南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以及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名誉院长，才第一次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待了整整 1 个月，并开始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此前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体验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

在海南大学门前留影

最接近“中式生活”的时期是我在澳门工作的 3 年。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依托“一国两制”方针。我在澳门的公寓距离澳门与内地的交界处只有 50 英尺（约 15 米），每天早上我都能看到围墙另一边内地公安局旗杆上升起的五星红旗。当然，每天深夜耳畔的车流声肯定来

自不远处的内地。

到访澳门濠江中学，濠江中学是澳门著名的“红色中学”

如果说澳门人有些“认识上的分裂”，大概也不为过。他们认为澳门既属于中国，又“不太像中国”。看到香港曾发生的混乱现象，我开玩笑地对澳门朋友说：

在香港，人们更关注“两制”，而对“一国”关注太少。

在澳门，却刚好相反！

香港和澳门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部分香港人住在港岛和九龙，距离香港与内地的边界较远，无法每天都看到内地。而在澳门，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内地，触手可及。

但是，尽管生活在澳门，我意识里还是以“外部人”的身份观察中国和与中国人交往的。我父母是中国人，我早年在新加坡接受华文教育，中国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深深融入我的血液。事后再看，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成为我撰写本书的动力。

我在前面讲到，2016 年以前，我没有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毕竟，

在美国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物理学教授，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政治学家。后来我进入美国高等院校做管理工作，其后在企业工作了几年。在亚洲担任高等教育高级管理者的 10 年里，我深入参与了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和澳门大学 3 所高等院校的发展和管理。在每个岗位上，我都尽心尽力，让所在院校更好地实践了它们各自的教育使命。国内或国际上发生的事情，只要与大学的发展无关，我都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予以关注。

2016 年 6 月 16 日，在台湾与两位校领导合影：台湾成功大学前任校长赖明诏博士（Dr. Michael M. C. Lai）（中间），台湾清华大学前任校长陈力俊博士（Dr. L. J. Chen）（右）；他们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分别获得分子生物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是各自领域的杰出学者，鲜有人比他们更了解高等教育界的宗旨；与他们共事实属幸事

综上，2016 年之前，我对“一带一路”倡议还不怎么了解，它离我的日常生活还很远。直到我开始为在新加坡的演讲做准备的时候，我才开始认真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内容，并产生了研究兴趣，而这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我开始了解并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之后，我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如前所述，我 1945 年出生于印度，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举家回到中国，度过了 4 年颠沛流离的日子。那段日子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记忆，但我曾听父母讲起我们全家因为战争多次搬家，辗转全国各地。1950 年左右，在我们离开内地，或者说是被迫逃离内地之后，我们曾在澳门和香港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而后我父亲接受了当时新加坡英文报纸《虎报》编辑委员会编辑的职位，我们全家随之迁往新加坡。

Singapore Tiger Standard

SUNDAY MAGAZINE

The UNESCO "Statement on Race"

Text of UN document defining Race and how it came into being, by its chief author.

By Dr. ASHLEY MONTAGU

Basis for Discussion

"Mankind Is One"

Ethnic Groups

Free Supplement With Colour Comics, Sunday, November 12, 1950.

据维基百科显示，《虎报》由胡文虎先生创办，胡先生同时也是“虎标万金油”的创始人

图片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Singapore_Tiger_Standard。

接下来在新加坡生活的 14 年见证了我的成长。新加坡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我还是要说，新加坡永远是我的“故乡”。我在新加坡的华文学校完成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学习。我当时就读的小学叫养正学校（Yeung Ching School），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相比之下，我在新加坡就读的其他学校或许逊色一些。

养正学校是由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于 1905 年创办的，比 1911 年中华民国的成立还要早。大家知道，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残酷占领长达 3 年零 8 个月之外，一直到 1963 年的 139 年里，新加坡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养正学校实际上是为了让当地的广东孩子能有机会接受具有广东特色的华文教育而设立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学校的大礼堂里，有一个很大的孔子牌匾。

我单独提起这所学校还有一个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校的大部分教职工都来自中国，其中一位女老师名叫桂承平（已不幸去世），她举止十分优雅，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这在当时的新加坡是非常少见的。后来我发现桂老师不仅是优秀的老师，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下方是一张 20 世纪 90 年代的照片，其中就有桂老师。

照片里的女士就是桂承平

图片来源：http://sgcls.hi2net.com/blog_read.asp?id=99&blogid=3310。

桂老师很有魅力，深受学生喜爱。她常给我们分享她在中国时的经历，曾多次提起人们在过黄河的时候看到的泥沙被奔腾的河水带起来的景象，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她每次讲到这里都会满怀深情地说：“这条河真是名副其实的黄河呀！”事后回想这些画面，不难看出桂老师虽然身在新加坡，但一直心系中国！

桂老师经常提及黄河，凑巧的是，《黄河大合唱》的曲作者正是养正学校的著名校友冼星海先生，1939 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延安创作了这首家喻户晓的曲子。

冼星海

图片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C%E6%98%9F%E6%B5%B7。

6 年小学时光里，我身边充满了中国元素，这是学校的根与魂，而

我也有幸传承了这些文化基因。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冼星海 6 岁去的新加坡，在这之前他就住在中国澳门。尽管他在澳门待的时间不长，但因为他在中国的音乐地位极高，所以澳门有一条马路就以“冼星海”命名！

澳门的冼星海大马路

图片来源：https://macaulifestyle.com/city-guide/cafe-little-tokyo/。

也许是凑巧，但在一定程度上，冼星海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是跨时空交织在一起的。我现在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养正学校至少有一位世界知名的校友，只可惜这位校友不是我。

在新加坡上学的 14 年里，高一那年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当时中国文学课的老师要求全班同学背诵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的诗歌《琵琶行》。

虽然让学生背诵文章对这位老师（我应该是不喜欢他，因为现在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但我记得同学们那次都特别郁闷，因为《琵琶行》全文有 800 多字，而且非常晦涩难懂。可以想象要背诵下来需要花多长时间。我在家里边踱步边背诵，花了好几个小时，

试图把这 800 多个字一个个装进脑子里。

但最终能背下来时，我欣喜若狂。这样艰巨的背诵工程让我觉得我已经把这首诗刻进了我的灵魂。时隔 50 年，我再次读起这首诗，还是会感叹其中竟会有这么多不常用的汉字，比如“篦”字，如果没有任何上下文，我想我一定是读不出来的。然而，在背诵这首诗的时候，所有的句子，也包括“钿头银篦击节碎”这句，都能轻易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脱口而出！

白居易照片

图片来源：https://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17/4/12/65375.html。

我清楚地记得，终于能背下来《琵琶行》那一刻，我的心情不单单只是兴奋，还挺奇怪的，可能是因为我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背下了 1000 多年前古人所写的这首优雅且富有内涵的作品，这使我强烈意识到中华文化永远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年纪尚小的时候，我没办法表达出这种强烈的情感。60 年后，当我开始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时，我再次感受到了这种情感，并理解了它对我的意义。

回顾过去，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我在新加坡接受的中国文化教育，学习的深度和广度都不如台湾地区和大陆地区的学子，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在我的内心构筑了坚实的基础，让我能理解中国的文化内涵和处事方式，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中华文化与我之间的血脉相连。

关于我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和关系，有两段时光于我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至今令我难以忘怀。一段是我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理论物理系做博士后的两年，另一段是我在丹麦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Niels Bohr Institute）做客座教授的一年。

承载美好回忆的照片；一张 1973—1974 年曼彻斯特大学理论物理系的成员、教员、博士后和学生的合影，摄于曼彻斯特不伦瑞克街（Brunswick Street）附近的舒斯特大楼（Shuster Building）外；我是从下往上数第三排左数第二个

1964 年至 1972 年，我在美国完成物理学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习，那 8 年间，我对中国的科学发展情况一无所知。因此，当我看到曼彻斯特大学理论物理系图书馆订阅了中国的《物理学报》（*Acta Physica Sinica*）时，我颇感意外。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很少，看完杂志后才得知中国也有许多严谨的物理学研究。

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我被该刊物某期登载的一篇关于量子场论的论文所吸引，论文作者是何祚庥。论文内容与我的研究领域相隔甚远，而且是用中文写的，我记得那时候读起来很是费劲，但由于作者何祚庥是我在刊物上遇到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理论物理学家，我就硬着头皮把这篇论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之后几年，我去过几次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也有幸见到了何教授本人。

我在曼彻斯特的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或许在于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来自中国的科学家。他就是吴祖泽，世界级血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吴博士是上海人，因为我和妻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所以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从吴博士那里，我开始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吴祖泽博士

图片来源：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7%A5%96%E6%B3%BD/3502799?fr=aladdin。

1979 年，我对中国有了更深的认识。那年，我前往丹麦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尼尔斯·玻尔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中心，是建立量子力学的指挥部和大本营。众所周知，1978 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科学家开始出国访问，而后我有幸在尼尔斯·玻尔研究所遇到了中国一些非常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和粒子物理学家，如吉林大学的吴成礼博士、复旦大学的杨福家博士、清华大学的徐湛博士、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陈永寿博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冼鼎昌博士，并开始与他们展开合作研究。

尼尔斯·玻尔研究所；照片右边的一间房子是我工作了 2 年的办公室

图片来源：http://wotug.org/cpa2016/photos-copenhagen/NBI/niels-bohr-institutet-a.jpg。

通过与这些中国科学家面对面接触，我了解到了他们都有很强的科研能力，而且他们后来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成就斐然，享誉国内外。他

们让我知道，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处事之道，这时，对我而言中国不再遥远，无论情感上还是职业上，我感觉自己离中国更近了。

2007 年到 2014 年，我在台湾待了 7 年，对中国的国情和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先是在台湾成功大学担任资深执行副校长，后来又在台湾清华大学担任资深副校长。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中国的体制下工作，使我得以有机会深刻了解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感受。

摄于 1979 年的哥本哈根，我是左数第二个；我左边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博士后，我右边是吴成礼，中间的女士是哥本哈根大学医学院的一位访问学者，站在该女士后面的是陈永寿，坐着的是徐湛，最后一位是冼鼎昌

我在台湾生活的 7 年中，结交了许多好朋友，包括著名企业家陈嫦芬和她的丈夫古台昭，以及台湾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系的许多优秀教师，如王伟勇教授和陈益源教授。跟他们相处之后，我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还有一点十分有趣，新竹的台湾清华大学和大陆的北京清华大学有着同样的校训和校歌。它们各自的校徽（见下页的图片，左边的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校徽）基本是一样的，只有细小的差别。

值得提起的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徽是原版，是 20 世纪初期大学创建时在北京设计的。

台南与闽南在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深厚联系，以及两所清华大学之间的历史渊源和密切联系，使我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情感愈发深厚浓烈。

北京清华大学和台湾清华大学校徽

看到中国在 21 世纪的转变，我会问，1976 年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 2000 年，好友南京大学陈金全教授去世，我为他写讣告，在讣告里表达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拙见。

我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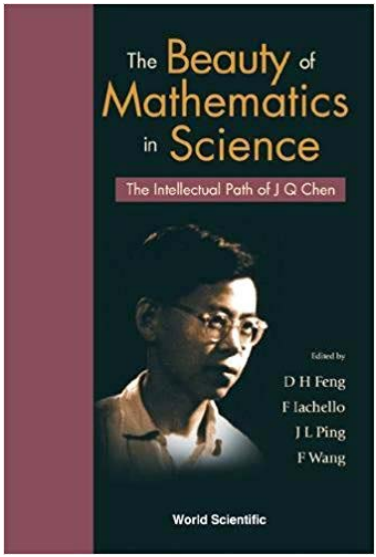
> 我的朋友陈金全教授，是一位世界知名的数学物理学家，于 2000 年不幸辞世。出版《科学中的数学之美：陈金全的智慧之路》（*The Beaty of Mathematics in Science: The Intellectual Path of J Q Chen*）这本由其朋友和同事共同撰写的科学著作，就是为了表达对陈教授的纪念。陈教授的一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的经历令人伤感亦鼓舞人心。
>
> 1976 年是现代中国不寻常的一年。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

逝世，随即“四人帮”垮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也画上了句号，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终有一天，历史学家们会称其为“20世纪的世界奇迹”。

1976年，经历了10年浩劫的彻底破坏后，中国的经济、技术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人口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25%，国土陆地面积约占亚洲大陆土地面积的22.1%，如果中国真的崩溃了，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但是，中国没有崩溃。

没有崩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数千万中国知识分子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承受着极致的艰难困苦与人身屈辱，但依然对自己、对家庭、对事业、对国家抱有强烈的希望。即使失去了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他们仍然是国家的重要支柱，维护着民族尊严。21世纪中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群人。



《科学中的数学之美：陈金全的智慧之路》封面

图片来源：https://www.worldscientific.com/worldscibooks/10.1142/5163。

我前文提到，先后拥有四个“国籍”并非我的意愿。虽然我对每个我生活过的国家都有深厚而忠诚的感情，但是，我血液里的中国文化基因，就像一根针一样，将这些不同的文化情感穿针引线连接起来，造就了现在的我。如果没有这些经历，我很可能会拒绝潘博士的邀请，也就不会有 2016 年在新加坡所做的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演讲。

对于一个从未接受过系统华文教育的人来说，我一直有一种对身份认知的不安感。后来我跟一个犹太裔美国朋友聊天，这种感觉才得到了缓解。当时我向他聊起了自己因文化血脉和国籍之间的不匹配而产生的不安与困惑，这引起了他的共鸣，他听完后马上回应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是犹太人，我也有这种感觉。无论犹太人在哪里、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我相信大多数犹太人同胞都会深深感受到，犹太文化永

远深刻地植根于我们心中！”

在这张令人难忘的照片里，北京清华大学时任校长陈吉宁与台湾清华大学时任校长陈力俊各自率领校领导团在新竹校园里向两岸清华大学“不朽”的校长梅贻琦致敬

因此，正是我深厚的中国文化基因，让我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兴趣，而后又深度参与研究，努力挖掘“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并阐述该倡议对我本人、对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意义。

遂成本书。